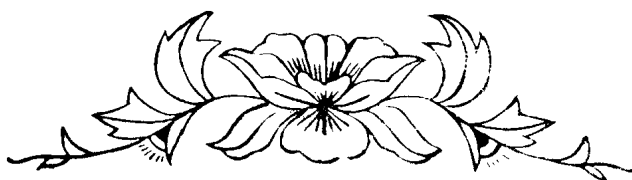


西域少数民族诗选

西域少数民族诗选

(汉文古典诗词)

刘正民 星 汉 许 征选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重秋
封面设计 邹红彬 夏地艳
封面题字 启 功

西域少数民族诗选

(汉文古典诗词)

刘正民 星 汉 许 征 选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28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7-228-00509-0/ I·171 定价: 2.25

序 言

谷 苞

西域是一个很古老的政治地理的名称。自从西汉政府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以来，一直到1884年清朝政府在新疆建省以前，在我国历朝历代都一直沿用着西域这一名称。西域包括着广狭二义：狭义 的 西 域 仅指我国历代政治直接统辖的地区；广义的西域包括西方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在《汉书·西域传》中把中国和外国 的界线是划分得清清楚楚的，西域都护所管辖的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至于“康居，大月氏，安西……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

清朝政府在统一全国以后，曾把狭义的西域和我国云、贵、川三省的几个地方均称之为新疆。当时对狭义的西域，曾数名并用。西域、西陲、新疆等名称的使用，屡见于公私著作中，如：《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西陲要略》、《新疆识略》等书就是这样取名的。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就逐渐通用新疆这个名称了。继我国清代学者龚自珍等人之后，左宗棠曾极力主张建立新疆省，以巩固边防，抗御外国侵略。这个正确的主张，终于为清朝政府所采纳。左宗棠在1882年给清朝政府的奏议中曾提出了“他族逼处，故土新归”的论点（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五十七卷）。这是含有深刻的

意义的。“故土”云者，自汉唐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新归”云者，是指1878年和1882年从沙俄侵略军魔爪中收复的失地。因此，在热爱祖国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新疆这个名称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名称，是一座富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丰碑，有着收复失地的纪念意义，有着驱逐外国侵略者的纪念意义。

自秦汉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民族对于祖国的缔造都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各个民族文化的荟萃。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从而产生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当然不能讳言，在历史上曾有过史不绝书的民族纠纷、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但是，它们只居于次要的地位，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支流。由于在历史上长时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在我国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实际上都包括着三个部分：①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即本民族的特点和特长；②接受国内和国外其他民族的文化；③中国各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文化，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每个民族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谓民族文化的纯洁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心理状态。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从来都是发展本民族文化所必需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里就肯定了两个方面的进步作用，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促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一方面又肯定了汉族在促进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作用。由于汉族历来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目前占93.3%；而且还由于汉族主要聚居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中下流，有着发展经济文化比较优越的地

理环境 and 经济条件，从而汉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发 展中国经济文化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一点也是同样需要说清楚的。

在我国历史上，匈奴人建立匈奴帝国是使用汉文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是使用汉文的，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南诏是使用汉文的，已经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的麴氏高昌国的居民也是使用汉文的。蒙古族原无文字，当初对南宋、辽（契丹）、金（女真）的文书，均使用汉文……。到现在，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僮、满、回、苗、土家、白、羌、畲、京、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也都使用汉文。在历史上，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出了为数众多的学者，其中有许多人使用汉文写下了大量著作，涉及科技、医药、天文、历史、语言、文学等许多方面，成为了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后，我长期在新疆工作，曾涉猎过一些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学者用汉文所写的著作，并写过几篇文章作了介绍。常感有些古籍已不易见到，有些诗文散见于群书之中，查阅很不方便。前些天，新疆师范大学的刘正民、星汉和许征三位同志将所选注的《西域少数民族诗选》送给我看，并约我写篇序言。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完了全部书稿。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为读者阅读和欣赏古代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歌，提供了方便条件。当然，这本书在这方面所起的有益的作用，还是首先应该肯定的。

对于诗歌，我是一个门外汉，对于收入本书的四百多首诗歌在文学上的成就，我是没有能力加以评论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研究战线上的老兵，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是大有裨益的。我相信：汉族同志读了这本书，会对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能够加深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读者读了这本书，会产生民族自豪感，为批判地

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而开阔视野。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说明了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

万事开头难。伴随着这本新书的出版，必然会同时带来若干缺点和不足。这，并不可怕。出版后通过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及编者们的继续努力，再版本将会选注的更为精当和全面。对此，人们会寄以期望。

1985年8月1日于新疆社会科学院

前 言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民族之间曾经不断地进行过攻伐、掠夺、奴役，同时民族之间也曾互相依附、团结、吸收、融合。通过这两种关系的演进，锻炼成了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各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民族大家庭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中，有些少数民族除了有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外，还有用汉文创造的文化遗产，而且他们的汉文创作要早于本民族文字的创作，因为他们在本民族文字产生以前，有的已经用汉文进行创作了。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时，他们的汉文作品，也应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少数民族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源远流长，《诗经》中就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诗歌。我们这里提供给读者的是西域——今新疆及其附近的少数民族历代诗歌创作的概况和部分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这部分文学遗产的发展线索和所达到的水平，并借以探讨西域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对研究民族关系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借鉴。

西域少数民族从什么时候起用汉文进行创作，我们未作考证。成书于战国之前的《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歌谣，或可作为我国西域民族最早的汉文诗歌。西王母作为神话传说的人

物，其人未必实有，但可作为古代传说中的西域少数民族的代表；所咏歌谣，更未必为其亲作，但却表达了西域民族与内地民族和平友好的愿望，成为西域与内地构通的早期信息。周穆王是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历史人物，其西巡时与当地人民唱和，事亦未必荒诞。因此，西王母歌谣的汉文本不管出自谁手，其源出于当时西域民族的歌谣，则不应怀疑它的可能性。

两晋以后，佛教在内地广泛传布，西域高僧多至内地传经说法，其中如佛图澄、康僧渊、支昙谛、鸠摩罗什诸人，曾用汉文诗歌形式宣扬教义，或作谶语赠答，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西域少数民族有作者可考的第一个诗歌创作时期。他们虽非有意进行文学创作，但其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西域少数民族用汉文作诗，则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开拓者。之后北魏时期产生的《敕勒歌》，作为今日维吾尔族族源的敕勒族的民歌，当时就译为汉文，流传至今，以其劲健豪壮、朴素自然的风格在文学史上产生广泛影响。敕勒川固不属西域，然敕勒族演变为今日的维吾尔族，主要聚居新疆，所以当我们论及西域少数民族汉文作品时，自不应忽视这一杰作。

降至隋唐，西域胡人何妥存诗六首。他是一位音乐家、学者、诗人，对我国文学艺术的贡献值得重视。唐初，有一首高昌民歌，虽不能断定作者属哪个民族，但可视为民汉人民共同的创造，因当时高昌国掌权的汉人麹氏，背叛唐朝，被各民族人民所唾弃，共同唱出了那支嘲讽麹氏的歌谣。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民间知识分子坎曼尔，用汉文创作的三首诗，在西域少数民族汉文诗歌创作中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它是在西域的土地上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比生活在内地的少数民族用汉文写诗，更为难能可贵。

唐朝以后，天下大乱，宋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但它是中

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统一王朝。所以唐以后的三、四百年间，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西域各地和内地联系少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减弱，目前尚未发现宋朝西域少数民族的汉文诗作。不过在与北宋对立的辽朝，却出现了两位回鹘（维吾尔族）女诗人，即辽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和天祚帝文妃萧瑟瑟。在辽朝存在的二百多年中，有十来位萧姓的后妃出于述律氏，其中包括三位“称制”摄政的萧太后。而述律氏本为回鹘中的较强氏族之一，《辽史·外戚表》载：“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辽史·后妃传》也说：“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应天太后），其先回鹘人糯思。”自唐中叶以后，契丹皇室耶律氏与回鹘述律氏世代通婚，述律氏始终参与辽朝国事。辽太宗曾赐述律氏内侄“小汉”名为萧翰，于是述律氏家族改为萧姓。

道宗懿德皇后萧氏，小字观音，美姿容，善谈论，好音乐，工诗，于琵琶尤精。太康元年（1075），遭人诬陷，谓与伶官赵惟一有私，道宗怒，赐死，年仅三十六岁。天祚帝文妃萧氏，小字瑟瑟，看到天祚昏愤无道，疏斥忠良，作了两首讽谏歌以进，遭天祚衔恨，在诸皇子争夺权位的斗争中被诬赐死。萧氏能文者尚有人在，对其作品还可进一步发掘。

北方蒙古族兴起后，它的骑兵奇迹般地席卷了欧亚大陆。从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兴兵西征，到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历时七十多年；从灭南宋到元朝覆亡九十多年，前后凡一百六十多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征伐、大融合、大吸收的时代。蒙古族及西域少数民族进居中原，迅速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用汉文创造了大量作品，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代表了西域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有元一代，诗词的成就固然不能与唐宋相比，然而百年左右存诗达三万首，比之唐代三百年存诗五万首并不算少，其中少数民族作家二百余人，作品数量在四千以上。西域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

创作放出奇异的光彩，有些作品的艺术水平比之同时代汉族诗人的作品毫不逊色。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有作品传世的诗人在五、六十人以上，其中可以确定为维吾尔族的就有二十多人。这些作者中，堪称一代诗人的有马祖常、贯云石、薛昂夫、萨都刺、乃贤、丁鹤年等。他们不仅作品数量多，艺术成就也比较突出。在他们的作品中，粗犷豪放的草原精神与中原传统文化融汇在一起，不惟在元代诗坛上别开生面，即在我国整个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创举。虽然由于元代以及后来的统治者重视不够，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失传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但仅从现存的这些看来，其气魄之宏大，意境之清新，音调之响亮，就已经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元初，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有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和耶律铸父子。世祖忽必烈也存诗一首。看来元初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是重视使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西域少数民族中的开功国臣、诗名卓著的有伯颜和不忽木。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雄伟的气概，反映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时代的风貌。蒙古族的伯颜长于西域，至元十一年（1274）为中书左丞相，总兵攻宋，至元十三年进军临安。史称伯颜善诗文，但其作品传世者很少，今存《奉使收江南》等诗三首和散曲小令一首，作于南下进军途中，表现了元军气吞山河的盛大军威，以及作为大军统帅叱咤风云的气概和指挥若定的气度。“山河判断在俺笔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中吕·喜春来》），大笔一挥就要判定天下，气概实在不凡。被元世祖视为“左手”的不忽木，出身康里部贵族，英姿特出，进止详雅，虚心向汉族知识分子学习，日记数千言。作品流传也很少，诗只七绝一首，散曲套数《仙吕·点绛唇·辞朝》一套。虽一鳞半爪，而豪放俊逸，流丽可喜，涵虚子《词品》比之为“闲云出岫”，钟嗣成将其与贯云石、萨都刺并称。他的散曲套数用了十四个曲调，长达七

百余字，手法娴熟，内容是反复咏叹要辞朝归隐，反映了战争结束后产生的新的思想感情，对最高统治者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这两位元朝开国功臣的作品格调虽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其熟练的写作技巧为以后西域少数民族汉文诗歌创作高潮的到来开创了先河。

到了元代中期，一些开国功臣的后代和失意的少数民族文人，文学修养大为提高，诗词散曲的创作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这是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辈出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在为萨都刺写的小传中说：“有元之兴，西北弟子，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崖、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其能于袁（桷）、赵（孟頫）、虞（集）、杨（维禎）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乃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云。”意思是说，元朝兴盛之后，西北少数民族的弟子有了很深的文化涵养，出现了一批奇异之才。杰出的如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开宗立派，于当时文坛著名的汉族诗人之外，别开生面。继而至元朝中后期，雅琥、泰不华、乃贤、余阙等人，各逞才华，竞奇斗艳，极一时之盛。顾嗣立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这些统治阶层出身的诗人，受了祖国传统文化的教养，用传统的文学形式熟练地进行创作。他们不同程度地觉察到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尖锐，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并敢于在作品中反映现实，寄托感慨。有的抨击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的愤世疾俗，啸傲山林，不与统治者合作；有的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比热爱，热情歌颂大江南北的自然风光；有的登临凭吊，发思古之幽情。他们没有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又较有正义感，敢于讲话，不象有些汉族诗人那样在涉及时事政治问题时噤若寒蝉，所以在元诗中，能够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是这些西北

少数民族的诗人。

马祖常的七世祖在辽朝时从西域入中原，曾祖月合乃跟从元世祖征宋，父亲马润以文墨入官，守光州。祖常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中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他的散文当时亦负盛名，陈垣先生以为，元代西域散文家首推马祖常。《元文类》选其文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而尤致力于诗歌，长篇短章，圆密清丽，多可传诵。著有《石田集》。浙东廉访苏天爵在序中说：“公诗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四库提要》称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集中昆仲唱和之作亦伙，风流文采，萃于一门，彬彬称盛矣。”《都门一百韵》长达千字，《壮游八十韵》达八百字，比杜甫的《北征》（七百字）还长。马祖常未仕之前，历游名山大川，做官后又到过不少地方，一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其创作吸取了丰富的素材。他对人民的痛苦有一定的了解，诗中表现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揭示了阶级矛盾，对官场的黑暗和某些弊政有所不满。《踏水车行》、《缫丝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控诉了官府和豪门的剥削掠夺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溱洧波清多草树，百年生聚尚绳枢”（《鄢陵别南客》），元朝在北方的统治时间较长，将近百年了，中原地区肥美的土地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耕种，溱水洧水两岸长满了荒草野树，老百姓还用绳子系门，过着很简陋的生活。不满之意溢于言表。他在一首题画小诗中说：“石壁云生树，涛江雨暗船。居人属仙籍，长负免丁钱。”（《山水图》）言简意深，借题画大发感慨，说只有画中人才能免除沉重的赋税徭役，反衬出元代人民群众所受剥削压迫的深重。

这一时期有专集传世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还有高克恭、倪玉立、雅琥、聂古柏等。维吾尔族诗人、画家高克恭，诗有

《房山集》，其诗清淡细腻，神超韵胜，自得天趣，当时有人称赞他的绝句写得尤其好，以为大有唐人意度。也里可温人雅琥有《正卿集》，其诗流畅明快，多民歌风味，明朝文学家胡应麟极赞其“梅花路近偏逢雪，桃叶波平好渡江”，“一声铁笛千家月，十幅蒲帆万里风”等诗句，以为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诗名甚高。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诗作流传不多，而在文化艺术方面颇有名声的作者，如：色目人辛文房，诗有《披沙集》，今失传，仅存诗二首。另著有《唐才子传》十卷，颇得后人好评。回回人哲马鲁丁，官至集贤大学士，精历法，著《万年历》，诗仅存一首。龟兹人盛熙明，工翰墨，通六国文字，著有《书法考》等，也只存诗一首。不忽木的两个儿子回回和嚧嚧，皆博学能文，工诗，又都擅长书法。

在这一时期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中，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元代的少数民族诗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西域人萨都刺了。史料记载萨都刺是西域色目人，西域回回人，答失蛮氏（伊斯兰教徒）。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蒙古人。因此有人以萨氏为回族或蒙古族，都缺乏充分的证据。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萨氏为回纥人。我们也可以认为萨都刺是在十三世纪前信仰了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萨都刺的诗在当时已负盛名。同时代人干文传在《雁门集·序》中说他的诗“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开，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乃以一扫往宋萎靡之弊矣。”明人毛晋在为《雁门集》写的跋语中说：“天锡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半山（王安石）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余于天锡亦云。”把萨都刺与唐宋名家相比，甚至看得高于宋人。萨都刺生前把自己的诗词集为《雁门集》，

存诗七百九十八首，词十四首，散曲套数一套。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诗人，作品中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有些直陈时事的诗如《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过居庸关》等，都触及了社会矛盾和弊端，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穷兵黩武，祸国殃民，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深表同情。他一生踏遍大半个中国，饱览山水古迹之胜，写了大量纪游诗和山水诗，再现了北国的壮丽，江南的秀媚，其山水诗就象一幅幅优美的水墨画。他本擅长书画，他的《严陵钓台图》和《梅雀》，至今还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萨诗尤以宫词出名，历来受到很高评价。前人评萨氏诗风，有人说有李长吉之高格，有人说他善学李义山，有人又说他“诵法青莲”。元诗人杨维禎说：“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胡应麟《诗薮》称萨氏《山中怀友》“故庐南雪下，短褐北风前”一联，“句格鬳整，在大历、元和间殊不多得也。”大多异口同声地把他与唐代名家相比。说他学李贺也好，学李商隐也好，学李白也好，比王建、张籍也好，都说明萨都刺学诗不宗法一人，善取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格调近唐。萨都刺的词虽然只有十几首，却风格豪迈遒劲，在吊古伤今中融进磊落旷达的情怀，如《金陵怀古》、《登石头城》，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萨都刺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诗人，在当时就受到各族人民的敬仰。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不断推陈出新，元代，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兴盛起来，这就是和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一些西域少数民族作家，不仅能创作传统的诗词，而且在散曲创作方面也有杰出成就。特别是到了元朝中后期，西域少数民族散曲作者出现了几位名家。成就最突出的是维吾尔族的贯云石。贯云石具有多种艺术才能，诗、词、曲、文都有很高造诣，音乐、绘画、书法无不精通。作品有《酸斋集》，与徐再思（甜

斋)之曲合称《酸甜乐府》。传世作品以散曲为最多,有小令七十九首,套数八套。曲的风格豪放飘逸,骏逸为当行之冠。贯云石辞官不做,甘愿过隐居生活,“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双调·清江引》)甚至把生死置于度外,其《辞世诗》说:“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圆。”一点也不为自己之将死而悲哀,胸襟旷达,还带点玩世不恭的情绪。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曲一样充满豪放之气:“昨夜渔歌动湖末,一分天地十分秋”(《岳阳楼》),气魄恢宏阔大。这类佳句并非偶见,“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剑蒲》),“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神州寄友》),均可见其写诗的功力。他的《芦花被》诗并序,赞咏芦花被和渔翁生活,抒发崇尚高洁、不同流俗的情操,当时广为流传,被视为文坛佳话。

维吾尔族诗人薛昂夫,存世作品也以散曲为主,有小令六十五首,套数三套,流丽闲婉,新严飘逸,为元散曲一大家,与贯云石齐名。西域少数民族散曲作者还有阿里耀卿和阿里西瑛父子、玉元鼎、兰楚芳、孟昉等。在元散曲这一灿烂的花坛里,西域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争奇斗艳,焕发出悦目的光彩,为元代文学的繁荣做出杰出的贡献。

元末明初,西域少数民族重要诗歌作家有泰不华、乃贤、余阙、伯颜子中、丁鹤年等。泰不华,西域色目人,族别不详。《元诗选》有其《顾北集》,存诗二十余首。他的诗自然醇厚,形象鲜明生动,胡应麟称其绝句有唐人格调。余阙,唐兀氏,河西人,其祖父为西域人。元末余阙兵败自杀,明太祖朱元璋嘉其对元朝之忠,为之立庙,岁时祭祀。诗有《青阳集》。作品质朴高古,自然平易。《四库提要》称其诗“以汉魏为宗,优游沉涵,于元人中别为一派。”伯颜子中,卒于明太

祖洪武十二年(1379)，诗有《子中集》，《元诗选》只录十四首，多抒发元朝覆亡之痛。乃贤，一作纳新，字易之，葛逻禄人。曾多次漫游京师，晚年始授翰林编修。乃贤以诗文知名，每一篇出，士大夫争相传诵。有《金台集》行于世，存诗约二百四十余首。他生活在元朝由盛而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又广泛接触各种社会生活，对朝廷的昏聩、官场的腐败、民生的疾苦都有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写出许多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新乡媪》，深刻揭露了官府和豪绅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这类作品还有《新堤谣》、《卖盐妇》等。一些登临怀古之作亦颇有深义，《岳坟行》对岳飞的忠义给予极高的评价，对南宋统治者的自毁长城作了深刻批判。写塞上风光人情的诗，大都清新流畅，颇富民族和地方色彩。写江南风光的形象鲜明，富于生活气息。乃贤诗的题材内容和境界受杜甫影响较深，艺术水平较高，欧阳玄为《金台集》写的序中称其诗“清新俊逸”，贡师泰则评为“清润纤华”，并谓其五言“类谢眺、柳晖、江淹”，七言“类张籍、王建、刘禹锡”，而“乐府尤流丽可喜，有谢康乐、鲍明远之遗风”。

元末明初重要作家还有丁鹤年。鹤年西域回回人，三十三岁时元亡，卒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活了九十岁。鹤年为人重然诺，尚气节，终生不仕，有高士之遗风。天资颖悟，善诗歌，尤工于唐律。诗集通行者有二：《丁孝子诗集》和《丁鹤年集》。戴良《鹤年吟稿序》称其“古歌行皆清丽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致，尤其于五七言律。其指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节格调，则又兼得我朝诸阁老之所长。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诗人之所可及。”戴良与丁鹤年都忠于元朝，两人是好友，戴良的话或不无溢美，而近人陈垣先生也认为丁鹤年为元末诗人之后劲。鹤年诗多写亡国之痛，沦落之苦，反映